

【论 文】

“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前史：¹

顾颉刚西北考察的边疆思想史价值

袁 剑²

摘要：在抗战期间，顾颉刚曾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重要命题，引发当时全社会的广泛讨论，对此，学术界已经有过诸多的讨论。但是，理解他这一论述及其后续围绕这一议题相关讨论的“前史”，进而认知顾颉刚在中国及其边疆认知层面的阶段性特质，将不仅能够揭示一种更为全面而真实的边疆思想史个案，而且能够使我们更为“在地化”地去理解抗战期间西北社会内部的知识与思想逻辑，理解“共同体”结构在西北的生成与发展，从而对后来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有一个更为全面的知识史认知。本文从边疆思想史的角度对顾颉刚1937年4月至1938年11月的西北考察进行了初步的梳理与阐释，力图从中揭示顾颉刚从“地域共同体”到“边疆共同体”再到“人的共同体”认知的阶段性变化过程及其理论启示意义。

关键词：共同体；边疆思想史；顾颉刚；西北考察；中华民族

一、问题的提出：从边疆思想史理解中国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作为中国知识分子数千年经验提炼而成的认知传统，它不仅揭示了我們日常生活实践的逻辑，而且也印证了知识必须时刻与地理环境相印证与比对的事实。我们理解中国叙述及其自身内在逻辑本身，同样必须经历这样的过程，必须实践认知框架与地理现实相契合的思想路径。中国自身的人文地理特征及其在历史上形成的区域生态特质，在理念与实践上提供了理解这种“人—地”关系的现实性与可能性。

受不同认知视角的影响，从历时性的角度而言，我们对于中国本身与外部世界的认知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空间层面的“断裂”——“域内”与“域外”构成了我们认知中国与周边世界的分类基础，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基于近代民族国家结构的二元化分类，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中国疆域版图的历史关联性，在某种程度上割裂了我们对于西北历史空间的连续性认知与叙述，进而在“中心—边疆”的框架性结构中被进一步放大，构成了我们认知边疆及其社会历史空间定位上的一大难点。

这种基于古代史叙述与近代转变所造成的内在困境，在近代学人的叙述中已经有所反映，并以学科叙述的方式给予了某种具有可能性的回应。例如，梁启超在归纳清代史学的不足与成就时曾指出：“前清为一代学术复兴之时代，独于史界之著作，最为寂寥。……其他又尚有数类书，在清代极为发达：（一）表志之补续……（二）史文之考证……（三）方志之重修……（四）年谱之流行……（五）外史之研究，自魏源徐松等喜谈边徼形事，渐引起研究蒙古史迹之兴味。洪钧之《元史释文证补》，知取材于域外，自此史家范围益扩大，渐含有世界性矣。”³他的这段话，为我们提供了观察近代学术思想演进的一种进路，那就是，从近代开始，我们开始在传统的知识之外出现了边疆与域外空间的知识需求，这些知识不仅有助于扩大我们对于整个知识空间的认识，而且经由这种“连续性”历史的叙述，为我们自身的历史叙述提供更具逻辑一致性的解释可

¹ 本文刊发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年第5期，第142-150页。

²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四川师范大学特聘研究员。

³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30-31页。



能。

在这样的学术期待中，我们如何在当今具有普遍性的民族国家结构中去理解“天下”的生成逻辑，如何去认识费正清等人所指出的古代中国世界秩序中的第一圈和第二圈之间的独特关系，从而更全面地去理解“域内”的空间与互动关系，就成为我们在当下寻找新的整体性中国叙述的关键所在。“边疆思想史”作为一种在中国历史空间中构筑具有连续性与关联性的边疆区域整体叙事框架的尝试，它是一种非区域和超区域层面的结构思想叙述，不单单局限于对中央王朝关于边疆区域及生活在这些区域的诸族群的治理策略与思路的梳理与考察，而是建基于对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中原一边疆关系认知框架及其内部群体与政策互动关系的整体关系结构，其中特别关注中央政权的边疆政策在边疆区域内部的创造性转化与在地化实践问题，以及在这种转化与实践中所形成的内部关系逻辑与内在网络，这种思想史框架将能够超越我们既有的对于边疆的区块化认知，从而形成更具普遍性和解释力的中国内部区域互动框架与动力机制。¹其中尤为关键的是，如何认识和理解中国历史上各边疆区域之间的关联性，以及在边疆逐步汇聚成中国的过程中呈现的“统一环”结构。²

回望近代，在救亡图存的时代大潮中，以顾颉刚等为代表的爱国知识分子在这一方面的尝试与努力，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和思考“共同体”经由地域团结转向群体团结而呈现的近代思想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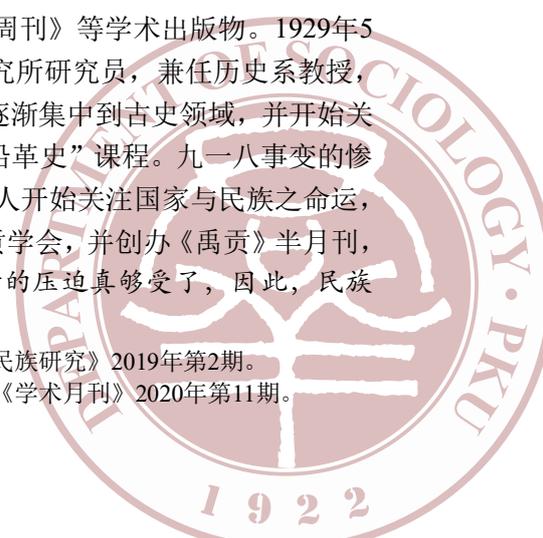
二、学术与命运：一个边疆思想史的个案

民国时代的人物与事件总是充满着内在的关联，同时也给我们当下的认知提供了一个特定的历史场景。除了作为历史时段的指称之外，民国本身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结构特质及其周边地缘政治的变迁，也深刻影响着当时学人对于国家与时代的理解与认知，并在特定的程度上改变着当时学人对于所处社会及其外部环境的看法。理解这种变迁，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整个历史与时代。

顾颉刚（1893-1980）就是其中的一位典型学人，他的学术路径、认知变迁与知识实践都与时代精神存在密切的关联。作为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顾颉刚出生于苏州的一个读书世家，传统学术的根底深厚，虽然对政治没有多大兴趣，但在青年时代依然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洗礼。1920年，顾颉刚自北京大学毕业，留校任助教，第二年，改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助教，任《国学季刊》编委，当时经常与年轻的胡适、钱玄同等人一起交流，探讨古史、伪书等问题，并开始着手撰写“古史辨”相关论文。1922年，应商务印书馆的邀请，顾颉刚开始编纂中学历史教科书，并准备将《诗经》《尚书》等古籍中的上古史传说整理出来，逐步形成其关于“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学术理念。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他的研究逐步转向民俗学，开创了诸多具有前瞻性和学术洞察力的研究议题。1926年4月，《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其石破天惊的论断与考辨，一举奠定他在史学界的地位。1927年4月，因人事纠纷，顾颉刚从厦门大学转任广州中山大学，后代理该校语言历史研究所主任一职，并负责主编《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等学术出版物。1929年5月，顾颉刚回到北京（当时已改名为北平），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兼任历史系教授，同时还在北京大学兼授相关课程。此时他的研究兴趣发生转移，逐渐集中到古史领域，并开始关注历史地理研究，并于1933年在北大和燕大开设“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程。九一八事变的惨痛事实，带给当时的中国学人以重大冲击，包括顾颉刚在内的很多人开始关注国家与民族之命运，并将这种关怀与学术结合起来。1934年初，他与谭其骧等筹组禹贡学会，并创办《禹贡》半月刊，在发刊词中曾发出这样的感慨：“这数十年中，我们受帝国主义者之压迫真够受了，因此，民族

¹ 袁剑：《边疆思想史：理解中国及其时空构成的一种可能路径》，《青海民族研究》2019年第2期。

² 袁剑：《从一般思想史到边疆思想史：一种人文—地理的关系学论纲》，《学术月刊》2020年第11期。



意识激发得非常高。……民族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件事，我们的地理学既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又怎样可以取得根据呢？”为此，他详细制定了《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在其中大力呼吁：“以我国今日所处地位之艰危，学术上实不容更有浪费，故定其价值高下必以需用与否作衡量之标准。……最初但就学校课业扩大为专题之研究，且搜集民族史与疆域史之材料，分工合作，为他日系统著作之准备耳。而强邻肆虐，国亡无日，遂不期而同集于民族主义旗帜之下；又以敌人蚕食我土地，四境首当其冲，则又相率而趋于边疆史地之研究。”

1935年，因国难日深，顾颉刚逐渐转向边疆地理研究，并于1936年创立边疆研究会。1937年夏起，赴西北地区考察并工作，9月，任甘肃“老百姓社”社长，编印《老百姓》旬刊。1938年春，先后赴临洮、渭源、康乐、岷县等地调查。10月，前往位于昆明的云南大学任教，并在《益世报》上开辟《边疆》周刊，亲自撰写并策划组织大批论述。1939年秋，前往成都，任内迁此地的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同年发表著名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文章，指出“汉人是许多民族会合起来的，他不是—个民族”。1940年4月，被聘为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委员，次年，赴重庆，5月，任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45年，再赴西北，出任兰州大学教授。1948年起，担任兰州大学历史系主任一职，并兼复旦大学教授。1949年，上海合众图书馆油印出版其《西北考察日记》旧稿。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复旦大学、中国科学院（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任职，并负责主持“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等事宜。1980年12月在北京去世。

在抗战期间，顾颉刚曾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重要命题，引发当时全社会的广泛讨论，对此，学术界已经有过诸多的讨论，这里不再赘述。但是，理解他这一论述及其后续围绕这一议题相关讨论的“前史”，进而认知顾颉刚在中国及其边疆认知层面的阶段性特质，将不仅能够揭示一种更为全面而真实的边疆思想史个案，而且能够使我们更为“在地化”地去理解抗战期间西北社会内部的知识与思想逻辑，理解“共同体”结构在西北的生成与发展，从而对后来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有一个更为全面的知识史图景。

三、“共同体”的发现

余英时在评述顾颉刚的学术经历时，曾认为他的事业具有三层背景：一是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过来者，仍有普及学术唤起民众的启蒙意识；二是民族危机的加剧为其结社办刊等文化事业提供了重要契机；三是他与傅斯年在学术方面的分歧与争衡，成为其重要的人生动力。这一判断为我们理解顾颉刚在抗战前后的思想转变及其关注重点提供了多方面的思想史资源，并揭示其基于生活空间、关注议题、共同体类型方面的认知转变过程。

（一）生活空间的变化：从城市到边地

生活空间在塑造人的认知层面占有重要地位。顾颉刚虽然出生于江南，但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寇步步进逼的现实深感忧虑，由此意识到中国边疆问题的严重性。正如他在“自序”部分所言明的：“不久，九一八变起，北平密迩松辽，唇揭而齿寒，知祸之不旋踵。又目睹日韩浪人横行市中，毒及乡里，为之切齿腐心，故编印通俗读物，广为抗日宣传。及热河失而北平陷大包围中，亟思边塞之事，是以频年游于平绥线上，且越阴山而达百灵庙，饮酪卧毡，与蒙古之主张自治者谈，因晓然于边疆问题之严重性。”¹尤其是随着西北之旅的进行，经由从长期居住的城市到广袤的西北边地的认识对象的转变，顾颉刚对于边疆的理解也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边疆著作的认识，而具有了基于实地调查经验的现实体验。这种生活空间的变化，使他充分意识到边疆作为中国之重要组成部分的地缘价值及其对于国家安全所具有的关键意义。

（二）关注点的转移：从民俗到边疆

¹ 顾颉刚：《西北考察日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67页。



关注点的转移，尤其是从民俗到边疆议题的转变，构成了我们理解顾颉刚观念变迁的重要一环。对于古史的质疑，实际上暗含着顾颉刚对两大层面的理解，即作为日常生活逻辑的民俗，以及作为国家叙述空间的边疆。如何将这两者纳入整个文学—史学史空间中加以叙述，始终是顾颉刚在构筑具有整体性的中国文学—史学史中的重要着力点。但是，由于时代的差异，他最初以民俗作为关注重点，以此作为重构中国古史叙述话语的切入点，而随着国难日深，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古史及其叙述本身受到现实政治的挑战，正是目睹这场危局的切身之痛，使顾颉刚个人的研究旨趣转入更为贴近时局的边疆事务，从之前的神话民俗开始转向边疆史地研究。

当然，这种转变中间也存在着民俗与边疆之间的关联。例如，他曾经这样描述汉代之前的世界观念，“在世界交通未大开的时候，一地的人类往往就把他们所居住的地方看作世界，这在地球上的民族差不多都是这样的。……说起我们中国的疆界来，在地理上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区域：往西面去有高山，往北面去有大沙漠，往东南两面去又是大海，四边的墙壁这样森严，怎不使人不信在中国以外还有什么很大的世界！……战国以前中国人的世界观念是非常狭小的……直到战国晚年，才产生出理想的大世界说——‘大九州说’和‘大四极说’与‘海外三十六国’等记载——来，那是受了域外交通和哲学思想，以及天文学等的影响而成立的。古代的域外交通以东西两方为盛，因域外交通而构成了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里的地名，更因此而反映出上古西方交通的一件大故事——周穆王西游的故事——来”¹。这种叙述鲜明地体现了基于民俗的边疆观念，以及在这种转变中呈现出来的对于中国与域外空间的连贯性认知期待。

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的1937年3月14日至17日，顾颉刚为《禹贡》半月刊“三周年纪念号”（第七卷第一、二、三合期）作《纪念辞》，其中写道：“我们不愿用了策论式或标语式的几句门面话来博取一刹那间泄愤的快意，而要低着头沉重着脚步走路，希望在真实的学识里寻出一条民族复兴的大道来。……我们要鼓动远游的兴趣，……使得荒塞的边疆日益受本国人的认识和开发，杜绝了野心国的觊觎。我们要把我们的祖先努力开发的土地算一个总账，……永不忘记在邻邦暴力压迫或欺骗分化下所被夺的是自己的家业。我们要把我们的祖先冒着千辛万苦而结合成的中华民族的经过探索出来，使得国内各个种族领会得大家可合而不可离的历史背景和时代使命，……团结为一个最坚强的民族。”这表明他已经将关注的重心转向了与时局更为相关的边疆议题上，而且也将这一议题与“中华民族”的时代使命联系起来。

（三）从“地域共同体”到“边疆共同体”

在将边疆安全与团结“中华民族”加以关联的过程中，顾颉刚注意到了既有的“地域共同体”的局限性，并意识到必须构筑起“边疆共同体”，并将之内化到当时的社会实践层面。

对此，他曾经有过一个思想层面的转变。在抗战全面爆发前，“民国二十三年的春天，我同家起潜叔（廷龙）旅行到包头，在狂风中荡了一次黄河的船；因为没有人认识，所以不曾打听到什么。夏天，我们得到平绥铁路局长沈立孙先生（昌）的招待，游察哈尔和绥远约一个月，与当地人士往来稍多，就收集了许多塞外的故事。最使我高兴的，是听得许多人讲起王同春开发河套的故事。河套的开垦是我久已听说的，尤其是‘民生渠’三个字近年常在报纸上见到；但为什么‘王同春’这个名儿直到现在才听得呢？我听了他们讲说之后，时常这样地问自己。……王同春是一个民族的伟人，贫民靠了他养活了多少万，国家靠了他设立了三个县。然而他的事业是及身而失败了，他的名誉除了绥远一带之外是湮没了。如果我们再不替他表章，岂不是证明中国太没有人了！”²对湮没已久的、开发西北的“边疆人”——王同春的事迹的揭示，使我们得以更为完整地理解和认知边疆地区的社会生活史。

到了1934年7月，顾颉刚“旅行还平。住在中央饭店，就眠已近十二时，楼上跳舞得正热闹，

¹ 顾颉刚、童书业：《汉代以前中国人的世界观念与域外交通的故事》，《禹贡》1936年第5卷，第3、4期。

² 顾颉刚：《王同春开发河套记（改稿）》，《禹贡》1935年第2卷，第12期。



音乐声与脚步声一阵阵地传来，使得我心里酸痛极了，向来不会滴泪的人也滴泪了。这一夜竟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回到学校里，看着大家无忧无虑的容颜，不禁暗暗地骂道：‘国将亡了，种将灭了。你们这班无心肝的人还快乐些什么。’从此以后，鸦片、白面、梅毒、大铜元、农村破产……永远占据了我的心。本来我们的精神是集中在学问上的，但从此以后，我总觉得在研究学问之外应当做些事了。就在这一年，‘九一八’的事变爆发。别人都悲愤填膺，我反心中暗喜，我以为如果没有这件事，二三十年之后，我们的国家是亡了，我们的民族是灭定了，再也翻不起来了。现在固然已到肺病第三期，但留得一口气，究竟还有起死回生的一点希望。日本人性急了，没有等我们绝气，就起来抢我们的产业，激起我们的自觉心和奋斗力，使得我们这一点希望能够化成事实。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所怕的，是我们捉不住这个机会而已。这三年中，我随处体察，觉得有觉悟的人渐渐地增多，只是没有人把他们组织起来。如果天佑中国，……有计划的一步一步走下去，中国还是有光明的前途的。”¹

这种期许，随着他自己的经历而体验日深。在他于1937年9月4日下午抵达苏州老家的时候，曾“览《申报》，载某译报员语云：‘予任译事三十年，从未见《字林西报》称誉中国如今日者。’此可见全国一心，国格已提高不少。天下事不牺牲而得成功者，未之有也”²。正因如此，对于西北考察之旅，他作了这样的期许：“是行也，为欲认识西北社会之基本问题，故舍康庄之陇东南及河西不游，而惟游于公路尚未通达之陇西，盖种族、宗教诸问题惟此一区为纠纷而难理也。”³可以说，在西北寻找一种充满整体感的“边疆共同体”，并理解其中丰富而具体的群体与社会关系，就构成了西北考察之旅的重要内容与目标期许。

（四）从“边疆共同体”到“人的共同体”

当然，“边疆共同体”并不是一种完成状态，而更多的是一种阶段性的进行状态，它构成了更为整体的“人的共同体”的某种区域类型。

在顾颉刚看来，“血统相同者的集团，叫做种族。有共同的历史背景、生活方式，而又有团结一致的民族情绪的集团，叫作民族。在我们的国家里，大家久已熟知可以分为五族，所以辛亥革命之后即高揭‘五族共和’的旗帜。我们暂不妨循着一般人的观念，说中国有五个种族；但我们确实认定，在中国的版图里只有一个中华民族。在这个民族里的种族，他们的利害荣辱是一致的，离之则兼伤，合之则并茂。我们要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非先从团结国内各种族入手不可”⁴。在某种程度上，顾颉刚无法全然回避既有的话语，依然在使用民国时期的“五族”话语来进行相关的论述，后续的西北考察活动丰富并修正了他的相关论述。

从1937年4月至1938年11月，在国内全面抗战爆发的关键时刻，顾颉刚率队考察西北尤其是甘肃地区。他明确了这次考察活动的学术目的，并意识到即将面对的是与当时的北平所不一样的社会环境。4月25日，顾颉刚出席西北移垦促进会成立会，并报告该会发起筹备之经过。在随后召开的首次理事会上，被推举为主席理事。当时的报道称：“西北移垦促进会河北移民协会，及燕大等发起组织之暑期西北考察团，定七月一日分五组出发，截至二十七日止，缴费参加者共九十二人，外地到平团员、计冀及津市十五人、沪复旦大学生十三人，二十七日夜车亦可到，现一切筹备均就绪，团长顾颉刚，副团长段承泽，将于一日晨九时率全体团员出发。”⁵是月，应绥远当局的邀请，在燕京大学组织绥远蒙旗考察团，由历史、社会和新闻三个系的学生参加，并邀请社会学系教授李安宅率队前往绥远各盟旗作实地调查，以作为积极开发西北工作的前期准备，这一考察团于4月4日出发，16日返回。也正是在这个月，顾颉刚还在燕京大学历史系组织汴洛考古

¹ 顾颉刚：《旅行后的悲哀》，《拒毒月刊》1934年第80期。

² 顾颉刚：《西北考察日记》，第177页。

³ 顾颉刚：《西北考察日记》，第169页。

⁴ 顾颉刚：《中华民族的团结》，《民众周报》（北平）1937年第2卷，第3期。

⁵ 中央社：《西北考察团定期出发》，《申报》1937年6月28日，第23039号。



旅行团，前往洛阳、开封等地调查当地古物遗存。5月10日，顾颉刚参加这一旅行团回校后的集会，并在随后的演讲中指出，中国内地与边疆旅行非常重要，不仅仅是增长个人见识，而且更应重视民间的疾苦，并鼓励同学们要多多到民间去体验真正的中国生活，方可谈救国。

5月，顾颉刚为《禹贡》专号（第七卷第六、七合期）撰《九州之戎与戎禹》一文，童书业在其文末作跋，并在该专号的《序言》中指出：“顾先生是以研究禹的传说著名的，他从前主张禹的传说起于南方民族，最近又提出一个禹的传说与戎族有关的新假定，虽然禹的来源到现在还不可确知，然而禹与戎族有关这个结论确是无疑的事实。顾先生从古九州四岳的疆域推测禹传说的发展，连带把九州四岳的起源问题也相当解决了。这是一篇极重要的论文：据他的研究，九州是戎族的居住地，四岳是戎族的发源地，而禹的传说也就盛行于这个区域；九州四岳与禹本是夏族的传说，但同时也是戎族的传说，所以戎夏本出一源，禹迹的广被乃是戎夏民族合作的结果。这根本摧毁了旧日狭隘的夷夏观念而给予人们一个新印象！”6月9日，顾颉刚为北平《晨报》撰写《边疆教育问题》一文，该文随即刊载于11日的《社论》。文中写道：“边疆教育是为边疆人民谋本身福利的一种教育，……因此必须与边疆人民之固有文化、物质生活发生关系，并尽量与当地社会势力合作，以减少阻力。”在西北考察的记载中，他注意到当地各族之间关系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期许：“信仰尚可以改变，生活的改变当然是不成问题的。待生活改变，汉、蒙、回、藏的人民齐向现代文化走去，再有什么此疆彼界，也何必再争什么你死我活。”¹

在这个月，顾颉刚还校对完成杨向奎、史念海合著的《中国疆域沿革史》稿件，寄给商务印书馆，第二年3月正式出版，顾颉刚与史念海共同署名。在这部书里面，他以历代疆域的沿革为线索，来叙述中国历史进程中的朝代兴替，最终涉及近代疆域版图的丧失，并强调了大众团结对于巩固边疆的重要性。

四、考察本身的实践性与思想史意义

葛兆光先生曾指出，书写思想史的时候“应当尽可能地梳理历史的脉络，警惕那些习惯的挑选眼光垄断了对文献的阅读，也要小心叙述者的无谓好恶独占了对思想的评价，特别是不要让怀有某种过于现实的政治意图来垄断这种历史的叙述，也防止层层积累已久的思想史观念遮蔽了那些空白的空间，让空白依然空白。”²或许我们有必要以此来更全面地观察和理解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叙事话语及其相关联的疆域空间的成型过程，并以之理解其中主要学术思想的流变历程。

近代中国民族叙述话语的转型，一方面固然受到现实政治的影响，而在另一方面，则带有在共同面对帝国主义入侵时寻找某种继承性的图景。如杜赞奇所言：“中华民族开始由‘五族’（满、蒙、藏、回、汉）组成，从而中华民族继续承袭着大清帝国的边界线……种族作为民族基本成分的叙述结构本身也烟消云散，或许被纳入了更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历史经验的更大的民族主义的叙述结构之中。”³认识西北社会，寻找问题症结，是顾颉刚这次西北之行的主要目的，也在某种程度上构筑了他独特的思想路径。他在探访了兰州等数十座城市、乡镇，拜访多方人士之后，结合考察期间所发现的相关问题，认为有必要在如下几个方面有所推进。

其一，要改善当地落后状况，首要的是发展师范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培养专业技术人才。他在《西北考察日记》中指出：“现在最重要者即在各县办师范讲习班，俾得于短期间培养出若干师资以应急需……欲改变此风气，惟有提倡职业教育……”其二，结合当地番（藏）、羌、汉等各民族杂处的现实和现实交流的需要，有必要“以历史事实融和国族，实为此时代之迫切要求”。

¹ 刘俐娜编：《顾颉刚自述》，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71页。

²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1页。

³ [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7页。



他还注意到，“喇嘛既识汉文，具有现代知识，将来再由彼辈教育番民，番民皆惟喇嘛之命是听者，改造其思想生活自必顺利”。其三，结合西北宗教、种族中的汉、回、番（藏）三方势均力敌的现状，指出了其在政治层面的一些典型特征及应对方法。最后，他认为通过增进国民教育，“汉、回、番三方自能以教育相同而思想同，因思想相同而情感互通，因情感互通而团结为一体”。其四，在研究态度上，不满足于走马观花，而“甚望以监禁方式施之研究室，以充军方式施之于旅行考察，使我胸中久蓄之问题得告解决而系统之著作亦可完成，此生便无憾矣”。这是顾颉刚先生在考察西北的过程中发出的宏愿，也成为激励他后续数十年边疆研究的动力所在。

在这些相关对策措施之外，更值得注意的则是他在这次考察中所呈现的思想转型。概括而言，从国史质疑到边疆实践，从发现“层累的历史”到寻找充满复杂性却具有共同性的中国，这是顾颉刚西北考察活动独特的边疆思想史价值所在。

第一，他的考察活动得以反思中国“层累历史”的意义，并以边疆的视野来重构新的历史连续性。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言：“顾先生尽管在辨伪与考证各方面都前有所承，然而他的‘累层构成说’却是文献学上一个综合性的新创造，其贡献是长远而不可磨灭的。把‘传说的经历’看得比‘史迹的整理’还重要——这种中国传统考证学者在历史意识方面所从来没有达到的高度。顾先生并不是从事平面的辨伪，如一般人所误解者；他是立体地、一层一层地分析史料的形成时代，然后通过这种分析而确定每一层文献的历史含义”。顾颉刚在面对时局变动的观察中，逐渐意识到原先解构古史在抗日救亡的大背景中所可能面对的消极影响，转而通过积累西北经验，从边疆叙述的角度来重建中国内在的历史性联系。

第二，经由顾颉刚先生的西北考察，曾经一度在边地特征与央地关系中长期存在脱节的“边政”研究，开始形成了内在社会分析与外部结构性关联的视角，并具有了历史地理的维度。经由这些改进，逐步生成了基于人文-地理结构的西北边疆研究传统，并强调其内在的群体关系问题，影响深远。“西北之地，国防经济两端，俱有其重要性，而欲为此两端之建设，则教育工作实居首要。”¹

第三，顾先生在考察过程中，基于“边疆共同体”的实践，开启了“人的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新思考。“一种对民族团结之关切，贯穿于他呈送给庚款董事会的西北教育考察摘要和报告。在一堆专门性的细节和叙事的材料中却只有一个论点——西方式的科技与中国人文主义的教育相结合，当可对他所看到的两个基本问题提供解决之道；这两个问题是：经济落后（他认为中国西北有的是资源，但未能利用）和不团结而敌视。”²改变这种状况，提振经济、塑造团结，将是后续的重要任务。

在近代，知识分子在中华民族议题上的激进与保守，成为其在中国社会变革层面群体类型的折射与反映。³我们重新探究围绕“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相关讨论的“前史”，对于理解其中的思想演进与变迁，显得尤为必要。寻找到这一“前史”，将为我们更全面地理解这一“整体史”提供足够的空间与可能。在此基础上，我们或许能够更好地理解1993年时，费孝通先生论及顾颉刚的那段话：“其实从学术观点上说，顾先生是触及到‘民族’这个概念问题的。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抄袭西方现存的概念来讲中国的事实。民族是属于历史范畴的概念。中国民族的实质取决于中国悠久的历史，如果硬套西方有关民族的概念，很多地方就不能自圆其说。顾先生其实在他的历史研究中已经接触到这个困难。他既要保留西方‘民族国家’的概念，一旦承认了中华民族就不能同时承认在中华民族之内还可以同时存在组成这共同体的许多部分，也称之为民族了。……”

¹ 顾颉刚，《西北考察日记》，第170页。

² [美] 施耐德：《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民族主义与取代中国传统方案的探索》，梅寅生译，台北：华世出版社1984年，第319-320页。

³ [美]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刘尊棋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221-222页。



如果人神可通，他一定不会见怪我旧事重提，因为历史发展本身已经答复了我们当时辩论的问题。答案是中华民族既是一体，又是多元，不是能一不能多，能多不能一。……我们这个统一的中华民族来之不易。历经几千年，是亿万人努力创造得来的成果，我们子子孙孙自应力保其繁荣、富强、完整、统一。”¹可以说，民族的荣光不仅在过去，也在将来。在爱国知识分子的心中，所有对于过去的叙述，都指向未来的希望。

【论 文】

超越民族主义：“多元一体”的清代中国² ——对“新清史”的回应

张志强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编纂完成，这是康、雍、乾三世百年来开疆拓土的成果，是中国疆域的最终奠定，也几乎是中国疆域的最大范围。历史学家谭其骧曾经纲领性地把“历史上中国”的范围规定为“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而这个“历史上中国”的范围其实就是《嘉庆一统志》中的清朝疆域。

清朝的疆域何以会如此大？它是如何形成的？何以是北方民族建立的清朝完成了两千年来中国历史的根本任务——在南北之间、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之间创造出一种政治统合模式，使长城失去其南北屏障的作用而成为一道壮丽的景观？近代以来的中国何以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之下还能基本保有清朝的疆域？我们该如何理解清朝疆域的性质？我们又该如何看待清朝疆域与现代中国疆域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我们应该如何重新认识清朝之于中国历史的贡献。

对“天子”制度和“天下”政治的创造性继承

清朝疆域的历史形成，也就是说清朝最终“一统天下”，从根本上讲，是一个逐渐依循、运用“天下”政治逻辑的过程——即满洲作为一个部族政权在完成自身的内部统合之后，不断超出部族视野的限制，逐渐具有了“天下”意识，逐渐尝试运用“天下”政治的符号与价值，谋取“天下”，争当“天下”之主，从而实现了“天下一统”。

在建立“后金”以继承金朝正统而向明朝开战的过程中，努尔哈赤逐渐形成了北征蒙古、西征大明、南征朝鲜的战略意识。不过，努尔哈赤这时并未确立起最终一统天下的战略图谋，甚至，有鉴于辽金两代“不居其国，入处汉地，易世之后，渐成汉俗”的教训，努尔哈赤强调的是以山海关以西、辽河以东“为各自国界”，建立独立的国家。只有当皇太极实现了对漠南蒙古的整合以及对朝鲜的控制后，改国号为大清，改族称为满洲之时，“大清”统一“天下”的历史才正式开端。其明确的象征就是皇太极称帝祭天，改元崇德。

¹ 费孝通：《顾颉刚先生百年祭》，费孝通：《人间，是温暖的驿站：费孝通人物随笔》，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第116-117页。

² 本文刊载于《文化纵横》2016年第2期，第94-103页。

